

前言ⁱ

有关隐喻、转喻的论题一直备受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隐喻观、转喻观或相关理论。比如，修辞学派的修辞隐喻观(陈望道 1979; 亚里士多德 1991, 1996)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观(Halliday 1994; 胡壮麟 1996)，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Lakoff & Johnson 1980)，语用学视角下的隐喻类包含理论(Class-Inclusion Theory)(Glucksberg & Keysar 1990; Glucksberg 2001b)，等等。本书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介绍隐喻、转喻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前沿进展，侧重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研究，认知语言学将隐喻和转喻视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系统，并认为隐喻、转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思维的本质方式。这一跨时代观点的提出在学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为

i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概率模型的转喻识别英汉对比研究(17C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此资助，笔者深表谢忱。

1 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转喻都属修辞格(figure of speech)“比喻”的子类，是文学性文本或诗歌的专利。而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则认为，隐喻不完全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提供了一种认知事物的新视角(Burke 1973: 152)。尽管Burke也将隐喻视为一种劝说技巧，并强调隐喻的劝说功能，但Burke(1969, 1973)的观点与传统修辞学将隐喻视为装饰性修辞用法的观点有所不同，而更多地与当代概念隐喻理论契合。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这一核心理论，认知语言学内部就其理论本身及其适用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随着相关理论的发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不再局限于认知语言学领域内部，而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比如，受到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变异性；在语料库语言学技术的推动下，隐喻、转喻的标注和相关语料库建设正蓬勃发展；对于非语言层面的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探索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宝库（如，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中汲取营养；而要揭示隐喻、转喻的加工、理解规律，还需借助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在此，须强调一点，尽管本书采取“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相关章节内容也主要围绕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开展，然而在当今学界，就隐喻、转喻研究（即便是“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而言，其“认知语言学”的标签性也正在减弱。此外，相关理论的应用成果也已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如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成果在广告界、电影界的应用，隐喻、转喻数据库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等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在当今背景下¹，如要从事隐喻、转喻研究，我们必须摒弃狭隘的学科观念，不可将眼光局限在本学科领域或某一理论“自娱自乐”，而应以更加开放的科学精神和合作模式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以揭示隐喻

1 笔者先后参加了隐喻研究与应用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协会网址为<https://www.raam.org.uk/>）主办的第8届（荷兰阿姆斯特丹，2010年，主题为“隐喻与语篇”）、第9届（英国兰卡斯特，2012年，主题为“思维与社会中的隐喻”）、第10届（意大利卡利亚里，2014年，主题为“交际、科学和教育中的隐喻”）、第12届（中国香港，2018年，主题为“跨语篇和跨领域的隐喻：从描写到应用”）大会以及“跨时间和跨体裁的隐喻”工作坊（西班牙阿尔马格罗，2011年）。就笔者的一种参会直感而言，此类会议的参会人员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背景。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不同语言学学派的隐喻、转喻学者（如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的盛会，更是吸引了大量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参与，比如广告学、电影学、翻译学、文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等。此外，通过分析另外一些相关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参会人员分布情况，如隐喻年会（Metaphor Festival）、修辞思维与语言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gurative Thought and Language）等，我们也不难看出隐喻、转喻研究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转喻)、语言、交际、思维、认知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本面向初涉本领域的研究者的著作，本书不要求读者受过任何认知语言学训练，但如果掌握一些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念，那将非常有益。鉴于笔者的水平和兴趣，本书无法完全覆盖隐喻、转喻研究的方方面面，只能尽可能地将相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最新动态呈现给读者。

全书共分为11章。第一章为导论，是全书的统领纲要。它首先阐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科学内容的发展，涉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方法论的完善；其次，介绍隐喻、转喻研究的社会学发展，具体体现于学会的成立，会刊的创立，以及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最后，概括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对学界的影响，其在应用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将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分别介绍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本质和类型，这也正是“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Metonymy Theory)的核心内容。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具体而言，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概念性、系统性和体验性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隐喻摆脱了被处理为纯语言现象的局限。限于篇幅，本章仅介绍了Lakoff & Johnson(1980)提及的三类概念隐喻类型，即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不同于概念隐喻，学界对“概念转喻”的界定尚存争议，主要有基于认知域的定义和基于原型范畴观的定义两类处理方案。无论哪种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转喻和隐喻的区别、联系，以及转喻与其他常见认知机制(如切面现象、活跃区现象、提喻)之间的边界问题。此外，对于转喻的分类，学界也仍未达成共识。这些内容也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

在介绍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基本概念、特征和类型之后，第三章以大量实例论证了隐喻、转喻在语义扩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转喻是范畴扩展、词义延伸的基本手段。身体部位词汇以及感知动词

的共时多义性和历时语义演变都离不开隐喻、转喻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词汇语义扩展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并非孤立地起着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促成了语义的扩展。针对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模型，如Goossens(1995, 2003)的“隐转喻”概念，Ruiz de Mendoza Ibáñez等人(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2002;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 Diez Velasco 2002)的四类隐喻、转喻互动关系，以及Geeraerts(2002)的棱镜模型。除了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以外，转喻链(或称为“连续转喻”“双重转喻”)也是语义扩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简言之，第三章主要是从“一形多义”(semasiological)的视角来讨论隐喻、转喻在语义层面的重要性，即某一语言形式如何通过隐喻、转喻机制发展出不同的意义。这是从语言形式出发看语义变化(variation in meaning)，从此视角看问题，有助于我们理清共时多义现象、历时语义演变的理据。

然而，要全面揭示隐喻、转喻的作用和功能，还需从“一义多形”(onomasiological)的视角出发，探讨对于特定意义或概念而言，如何选择隐喻或转喻的源域，源域的选择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等问题。比如，Kövecses & Radden(1998)归纳了一系列制约转喻源域选择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就具体个案研究而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关于情感范畴的隐喻源域问题：我们通常可利用哪些隐喻源域来表达某一类情感(如“愤怒”“害怕”“幸福”)？除情感隐喻之外，人类范畴所涉及的隐喻、转喻源域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某一人类范畴(如，“女性”“男性”“美女”)而言，我们可以选择哪些隐喻、转喻源域来表达？此类研究是从语义(或概念)出发，看称名变化(variation in naming)，这正是本书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可见，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从不同的视角方向来讨论语义问题，即从形式到语义(第三章)和从语义到形式(第四章)。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词汇的内部结构，从构词法层面来看，隐喻、转喻在词汇意义的构建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将围绕三类构词

法中的隐喻、转喻现象进行详细讨论。某种意义上，第五章是第三章内容——词汇作为整体，讨论其本义和隐喻义、转喻义之间的关系——在形态类型层面的延伸。对于派生构词而言，Janda(2011, 2014)认为，构词转喻与词汇转喻并无本质区别，二者形成一个连续统。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Brdar & Brdar-Szabó 2013, 2014b)，他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转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而削弱了此概念的可操作性。复合词构词过程中的隐喻、转喻现象也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根据复合词意义构建中所涉及的隐喻、转喻机制，Benczes(2006)将英语创新“名+名”复合词分为三类：基于隐喻的创新复合词，基于转喻的创新复合词，以及基于隐喻、转喻互动的创新复合词。而对于转化构词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转化构词过程涉及转喻，比如，“名词-动词”转化可能涉及行动图式中语义角色到事件整体之间的转喻关系(受事*fish*转化为动词*to fish*以表达“钓鱼”的事件动作)(Dirven 1999)；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反对将转化构词现象处理为转喻(如Cetnarowska 2011)。除了这三类构词法之外，其他构词现象是否涉及隐喻、转喻也值得思考。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即意义”(language is all about meaning)(Geeraerts 2006a: 3)，这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对意义的重视。在其看来，独立的词汇成分与功能性更强的语法成分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词汇和语法成分都是意义的载体，两者构成“词汇-语法连续统”(Langacker 1987: 18-19)。既然语言的词汇系统会受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影响，那么同样作为意义载体的语法系统也会受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影响。本书第六章的标题为“隐喻、转喻与语法”，将着重介绍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下语法隐喻和语法转喻的含义和工作假设，以及隐喻、转喻与一些传统语法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论元结构，情态范畴和代词回指现象。本章标题采用“语法”这一术语主要是出于章节安排的考虑，以对应隐喻、转喻在词汇层面的作用(参见第三、四章)，并非将

“语法”“词汇”分割为截然不同的系统。此外，在讨论隐喻、转喻和语法互动关系时，认知语言学者对形态和句法并未作严格区分；从广义上讲，“语法”本身也包括构词法(第五章)在内的各种结构的规则(参见 Panther *et al.* 2009; Brdar & Brdar-Szabó 2017)。可以认为，第五章与第六章都侧重于“词汇-语法连续统”上的“语法”部分。

要揭示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规律自然离不开对真实语篇中隐喻、转喻表达的具体分析。早期的隐喻、转喻研究中，学者通常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和内省来完成隐喻、转喻的识别和标注任务。这种操作方式难以保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可靠性，从而削弱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了提高隐喻、转喻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系统性，近年来，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措施，用于有效识别语篇中的隐喻、转喻。Stefanowitsch (2006a)总结了多种在无语义标注的语料库中抽取隐喻、转喻的方法，如：人工抽取、搜索源域词汇、搜索目标域词汇、搜索包括源域和目标域词汇的句子、依赖“隐喻标记”进行抽取；对于已标注语义场或概念映射的语料库而言，其隐喻、转喻的抽取相对容易，但抽取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料库的标注质量。目前而言，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是Pragglejaz小组提出的“隐喻识别步骤”(MIP)(Pragglejaz Group 2007)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进版MIPVU(Steen *et al.* 2010)。尽管目前学界对转喻的识别和标注尚未提出统一的框架，但已有学者根据具体研究目的，针对一些特定转喻(如，地名转喻、专名转喻)制定了识别和标注步骤。这些步骤或标准将分别在第七章予以讨论。

自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提出之后，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探讨隐喻、转喻的普遍性、概念性、系统性、体验性，以揭示隐喻、转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认知机制。鉴于人类身体体验的相似性，我们不难推断出，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可能存在类似的、通用的隐喻和转喻。隐喻、转喻的跨语言、跨文化可用性(availability)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然而，

体验性还涉及文化、社会多个维度，这些都可能影响人类的认知模式。受到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隐喻、转喻的变异。首先，与情感范畴、身体器官范畴以及地名范畴相关的隐喻、转喻跨语言、跨文化对比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次，要揭示隐喻、转喻变异背后的文化动因离不开以历史的眼光来探讨其使用规律。对情感隐喻历时演变的考察，可为相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提供补充；转喻历时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转喻变异既受到语言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语言外部因素（即，文化、历史、社会因素）的制约。此外，隐喻、转喻体裁维度上的变异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涉及三类研究：基于隐喻标注语料库的体裁变异研究，针对特定语篇的隐喻、转喻研究，以及基于自建语料库的跨体裁隐喻、转喻对比研究。最后，随着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探讨不同语言变体（如，世界英语变体，汉语变体）中的隐喻、转喻差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八章将围绕这些维度对隐喻、转喻的变异进行讨论。

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隐喻、转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构建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既然如此，若仅关注隐喻、转喻的语言表征，则无法验证这一核心观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Charles Forcevill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的素材从纯语言层面逐步拓展到了图像、手势、声音、音乐、电影等多模态媒介，从而推进了隐喻、转喻研究的多模态转向。在第九章中，我们将首先介绍模态的定义和分类，以及单模态隐喻（转喻）、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概念。接着，我们将借助大量实际案例，具体讨论广告、漫画等体裁中的非语言隐喻、转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非语言隐喻（转喻）的表征方式和特征。针对非语言隐喻、转喻的识别和标注问题（参见第七章），第十章将以Forceville的图像标注框架，Pérez-Sobrino的多模态隐喻、转喻标注框架，以及VISMIP视觉隐喻识别步骤为例进行详细介绍。此外，第十章还将在变异的视角下（参见第八章），考察非语言隐喻、转喻的跨语言/文化、历

时、跨体裁差异。这两章的内容可为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提供非语言层面的证据。

第十一章为全书结束语，归纳了目前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的发展趋势，并对隐喻、转喻研究提出总结性展望，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正如本文开篇所言，近年来，隐喻、转喻研究的跨学科倾向日益明显。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可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隐喻、转喻自动处理任务带来新的理论启示和方法革新；隐喻、转喻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也是目前学界的热点，主要涉及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顺序、加工脑区以及加工影响因素等话题。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正被广泛地应用于隐喻、转喻研究，这也进一步促进了隐喻、转喻研究跨学科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总体而言，本书旨在对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及其适用性进行较为全面的讨论。其内容不仅涵盖词汇、构词法、语法、语篇等语言层面的隐喻、转喻，还涉及非语言层面的多模态隐喻、转喻；不仅在概念层面分析隐喻、转喻的特征、类型，还对语言使用中的隐喻、转喻表达进行探讨；不仅有对隐喻、转喻的理论探索，也有对相关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在本书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一些术语加以解释。除专门说明以外，本书提及“隐喻”(metaphor)时，采用的是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的框架。该框架认为，隐喻并非修辞格，而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隐喻涉及不同范畴在概念层面上的一种映射关系。因此，将其冠名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比如，范畴“生命”和范畴“旅行”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归纳为概念隐喻——“生命就是一段旅行”；我们通常以小型大写字母来表示概念隐喻，即LIFE IS A JOURNEY。概念隐喻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被称为隐喻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或隐喻表达(metaphorical expression)，比如，*We have a rough road ahead*、*She's*

come a long way、生活中有太多的过客、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此外，我们需要注意：汉语术语“语言隐喻”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英文术语 *linguistic metaphor* 和 *verbal metaphor*。其中，*linguistic metaphor* 具体是指隐喻语言或隐喻表达，用以对比“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而 *verbal metaphor* 更多的是与“非语言隐喻”相对而言，前者是概念隐喻在纯语言层面的体现，后者则是概念隐喻在非语言层面（如视觉、音乐、手势等多种模态）上的体现。本书中，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转喻语言（*metonymic language*）/转喻表达（*metonymic expression*）、语言转喻（*linguistic metonymy/verbal metonymy*）的辨析与上述隐喻相关术语的解释类似。

本书第十章“隐喻、转喻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方法探讨”与以下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一定的重合：

- 张炜炜，2019，概念隐喻、转喻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方法探讨，《外语教学》（4）：20-27。

此外，书中部分观点散见于笔者已出版的专著第一章：

- Zhang, W. 2016. Demarcation and variability of metonymy. In *Variation in Metonymy: Cross-linguistic, Historical and Lectal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7-46.

在此，还想向读者简要交代笔者对隐喻、转喻研究兴趣的由来和本书的写作缘由。我与隐喻、转喻研究的缘分起于2006—2008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徘徊于认知语言学各个理论岛屿¹之后，我最终决定以“身体部位”转喻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并尝试结合语料库数据来探索“手”“嘴”“眼”转喻的分布规律。尽管现在看来，当初的研究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该研究激发了我对隐喻、转喻的浓厚兴趣。在小规模的数据分析中，我已注意到，“身体部位”转喻在不同体裁文本之间的分

1 Geeraerts (2006a) 将认知语言学视为一个群岛，各种相关理论就是散落其间的岛屿，有隐喻岛、转喻岛、构式语法岛、原型理论岛，等等。

布具有显著差异。这促使我在认可“转喻作为人类基本思维和认知方式，具有普遍性”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开始对真实语言使用中的转喻变异作更深层次的思考。2008年秋，我远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定量词汇学和变异语言学”(QLVL)研究组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课题便以转喻变异为研究对象，利用语料库技术和多元统计方法，从跨语言、历时、跨语言变体等角度对转喻变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试图解释变异背后的语言内部、外部动因。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入职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在此期间，我对隐喻、转喻的关注一直不减，研究兴趣逐渐从转喻变异的理论探索拓展到更具应用性的话题，如转喻的标注、转喻的(半)自动识别，等等。我相信，此类应用性问题的解决，将极大地提高转喻分析的客观性、科学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语料的规模，从而进一步促进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2016年7月，我收到张辉教授的邀请，撰写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策划的“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认知语言学”子系列中的《隐喻与转喻研究》一书。对此，我倍感荣幸和感激。这使得我能有机会梳理数年来在隐喻、转喻领域的学术积累，并带着更为迫切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跟随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但与此同时，我也颇感挑战和压力。一方面，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优秀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专著或论文集，如《隐喻学研究》(束定芳 2000)、《隐喻与认知》(苏以文 2005)、《隐喻认知功能探索》(谢之君 2007)、《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王文斌 2007)、《认知转喻》(张辉、卢卫中 2010)、《隐喻与转喻研究》(束定芳 2011)，等等。我要写书未免多此一举。另一方面，国内外隐喻、转喻研究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面对浩瀚的文献，我完全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之中，迟迟未敢动笔。

本书的成型和最终定稿出版，曾受到学界各方同仁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辉教授给本书撰写提供机会！香港理工大学Dennis Tay博士和北京交通大学丁研博士对于本书结构大纲的设定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丁健博士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曾就相关内容提出了建设性的问题和评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田笑语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她对全书做了细致、全面的校对工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陈阳老师、解碧琰老师、李晓雨老师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帮助，编辑部及该系列丛书总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专业的修改意见；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朱磊博士在本书写作期间给了我许多支持和鼓励。对于多方的关照，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在生活中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事业上对我百分之百的支持，若没有他的理解和付出，本书难以完成。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丈夫！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概率模型的转喻识别英汉对比研究(17C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此资助，笔者深表谢忱。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定稿，历时四年。虽然书稿几经修改，但受限于作者的学识和经验，难免会有一些不当与纰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本书一切疏误，概由笔者承担。

张炜炜
鲁汶大贝居安会院
2020年春